

徐勇 主编

先秦兵书

通解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天津市“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先秦兵书通解

主 编：徐 勇
副主编：邵 鸿
编著者：邵 鸿 徐 勇
黄朴民 王晓卫
赵 明 刘 庆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兵书通解 / 徐勇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 - 201 - 02222 - 9

I. 先... II. 徐... III. 兵法-中国-先秦时代
IV. E8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18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022)27307107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字数:348 千字 印数:1-3,500

定价:24.50 元

序

涂勇君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工作时,由于工作关系,我便与他相识。后来他主编的《新编中国史话》,作为“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结项时,请我写个推荐意见,我有幸翻阅了这部七卷本的大作,颇感涂君的史学功底之深。此外我还看到了他的其它几本著作,其著述之丰,不仅令人惊讶,而且使我从工作的联系,进而深化到从学术的沟通中知晓了这位学子。

现在摆在我案头的《先秦兵书通解》,是涂君主编的另一部即将出版的力作。我对先秦兵书一知半解,囑我作序,学不从心。但当你了解了这部著作时,便不能不有感而发。

当新世纪的朝阳普照五洲四海时,久远的先秦文化却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似乎是反差太大。殊不知,一种新文化的发展,常常要回到它的原点,去寻找力量和源泉,然后再前进,再发出耀眼的光辉。研究先秦文化,不仅是发掘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而且是为新文化的发展寻求力量和源泉。更何况,中国先进文化,本来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所以“先秦兵书”的选题,就很有价值。该书被列为天津市“八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又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补贴项目,是很有道理的。

主编涂勇君与五位对先秦兵法颇有心得的中青年学者默契相随,共付心血,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先成初稿,再经重新补充修

2 先秦兵书通解

改,终成40万言的结晶之作。该书收入了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六部兵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缭子》,并附录了可能是先秦兵书遗存的几部书:《军志》和《军政》、《握奇经》、《阴符经》。对这样多种类的兵书进行校勘、标点、简注,书前加“按语”,篇后有“通解”,不但是繁难、艰苦、严谨、精细的学术活动,而且代表了这一领域的前沿水平,出版后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涂君年轻而有建树,学史而通多科,是学者型的编辑,又是善运作的学人,其学术上的敏锐,事业上的积进,铺设了未来的广阔天地。

值此佳作面世之时,特致祝贺,并为之序。

郭凤岐

2001年6月21日

目 录

《孙子》通解(1)

计篇(12) 作战篇(16) 谋攻篇(21) 形篇(26) 势篇(31)
虚实篇(35) 军争篇(40) 九变篇(45) 行军篇(49) 地形
篇(55) 九地篇(59) 火攻篇(68) 用间篇(72)

《孙子》校勘记(77)

《吴子》通解(83)

图国第一(94) 料敌第二(97) 治兵第三(99) 论将第四
(102) 应变第五(103) 励士第六(106)

《吴子》校勘记(107)

《司马法》通解(109)

卷上

仁本第一(118) 天子之义第二(121)

卷中

定爵第三(126)

卷下

严位第四(132) 用众第五(136)

《司马法》校勘记(139)

《孙臆兵法》通解(141)

禽(擒)鹿涓(148) [见威王](153) 威王问(155) 陈忌问
 全(162) 篡(选)卒(167) 月战(170) 八阵(173) 地葆
 (176) 势备(179) [兵情](184) 行篡(选)(186) 杀士
 (189) 延气(192) 官一(195) 五教法(200) 强兵(203)

《六韬》通解(207)

卷第一·文韬

文师(222) 盈虚(226) 国务(228) 大礼(230) 明传(233)
 六守(234) 守土(237) 守国(239) 上贤(241) 举贤(244)
 赏罚(246) 兵道(247)

卷第二·武韬

发启(250) 文启(253) 文伐(256) 顺启(259) 三疑(260)

卷第三·龙韬

王翼(262) 论将(265) 选将(268) 立将(270) 将威(273)
 励军(275) 阴符(277) 阴书(279) 军势(280) 奇兵(283)
 五音(286) 兵征(288) 农器(290)

卷第四·虎韬

军用(292) 三阵(296) 疾战(297) 必出(297) 军略(299)
 临境(300) 动静(302) 金鼓(303) 绝道(304) 略地(305)
 火战(306) 垒虚(308)

卷第五·豹韬

林战(309) 突战(310) 敌强(311) 敌武(312) 乌云山兵
 (313) 乌云泽兵(315) 少众(316) 分险(317)

卷第六·犬韬

分兵(318) 武锋(319) 练士(320) 教战(322) 均兵(323)

武车士(325) 武骑士(325) 战车(326) 战骑(328) 战步(330)
《六韬》校勘记(331)

《尉繚子》通解(360)

卷第一

天官第一(370) 兵谈第二(374) 制谈第三(377) 战威第四(382)

卷第二

兵权第五(385) 守权第六(389) 十二陵第七(391) 武议第八(392) 将理第九(396)

卷第三

原官第十(398) 治本第十一(400) 战权第十二(403) 重刑令第十三(405) 伍制令第十四(407) 分塞令第十五(408)

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410) 经卒令第十七(412) 勒卒令第十八(413) 将令第十九(415) 踵军令第二十(417)

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419) 兵教下第二十二(421) 兵令上第二十三(424) 兵令下第二十四(427)

《尉繚子》校勘记(434)

附录(457)

一、《军志》、《军政》通解(457)

二、《握奇经》通解(460)

三、《阴符经》通解(463)

后记(475)

《孙子》通解

《孙子》是中国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直到今天,《孙子》的不少合理内核依然闪烁着科学的光泽,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树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孙子》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超越了军事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社会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孙子》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文化财富,它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被译成 20 多种外国文字,学习、研究和应用《孙子》的热潮在全世界经久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古老的兵书业已超越了国家的和时代的界限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一、《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曾有分歧的意见,争论辩诘延续了千余年。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臆,抑或某“山林处士”?有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的记载,《孙子》书中所反映的战争规模、机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称谓、文体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特征。因此,《孙子》一书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它的作者也很难肯定是孙武,而宜是其门人或再传弟子,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孙臆。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

其中有《孙子》和《孙臆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正与有关史籍关于孙武、孙臆的记述相符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臆各有其人，《孙子》的作者不是孙臆。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经“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参见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

我们认为，《孙子》一书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见于《史记》明确记载，战国、秦汉时代之人对孙武其人其书言之凿凿，而现代考古发现已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的可信性。《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一）孙武曾著有兵法，他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二）“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最原始且有力的证据。《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臆，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它像《韩非子》、《尉缭子》、《论衡》、《战国策》、《黄帝内经》等当时典籍亦有类似记载，这些情况显示，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共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提到“十三篇（篇）”，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

之内容与传本《孙子》内容相似,这样便从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黄云眉、钱穆诸人单凭《左传》记载之有无来论定孙武与《孙子》的关系,证据显然是贫乏的。对这一点宋濂在《诸子辨》中即予以反驳:“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至于言孙臆与孙子为一人,或言孙臆为《孙子》之作者,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烟消云散。

第三,否定论者常从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角度来论证《孙子》书带有明显的战国特征,进而考定其书成于战国时期,孙子非其书作者,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来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等“诡诈”战法已开始流行,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孙子》一书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越、楚诸国充当了先行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设伏、突袭、偷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且常常奏效(参见黄朴民、徐勇《试析〈孙子兵法〉与〈司马法〉在战争理论上的若干差异——兼论孙武军事思想的丰富源泉》,《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孙子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熏陶,在其著作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孙臆兵法·陈忌问垒》附简)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

现象来简单同战国特征之间划上等号,更不能由此而否定孙子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一书中也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某些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影子。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史实表明,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地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相当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以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了《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它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时代的精神。这些情况表明,《孙子》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方式嬗递的深深烙印,它成书于春秋末年。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书中有后人增益的成份,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焚舟破釜”等句颇可怀疑系后人窜入,《用间篇》最后一段也与全书“舍事言理”风格相悖。但是所有这些,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作者、其书作成于春秋末年这一基本事实。

二、《孙子》的著录、流传及版本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

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

西汉时期是《孙子》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封建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工作。第一次是汉初“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摭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同上)。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当均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的第一部。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其书。总之,经过刘向、任宏校书,《孙子》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所收藏。

《汉书·艺文志》溯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有明确的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有别于齐孙子(孙臆),至于其篇数为何由司马迁所说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同样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人们对《孙子》不断增益,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人们重新编排篇次所致。我们认为,以第一种可能性为大。所以三国时期曹操注《孙子》时,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孙子注序》)。这里需要附带指出的是,1996年西安“发现”的“《孙武兵法》82篇”,

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认定其抄本“纯系伪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写的”。所谓抄自汉简之说,绝不可信。

曹操的《孙子注》,乃是今天存世的最早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备受人们的推重。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录》著录《孙子》三卷相合,这表明曹操是就司马迁所说的《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也从反面证实了“十三篇”才是《孙子》的主体。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的事情。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云”,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等人的注释解诂。这些情况表明《孙子》一书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来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超出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刷业的进步,《孙子》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孙子》的推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统治者有鉴于国势积贫积弱,为了扭转这一颓势,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于军事问题,提倡研读兵书,探讨富国强兵之道。宋神宗元丰年间,正式将《孙子》与其它六部兵书合在一起,号为《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必读之书。《孙子》从此成了朝廷钦定武学经典著作。

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一致,《孙子》的著录也成为各类公私目录

书编写时所重点关照的内容,《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目解題》、《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目录书对《孙子》的各种版本、注家都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作注者不下二百余家,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而这种情况得以形成,除了《孙子》学文献研究本身所起的作用外,各类目录书对《孙子》书的全面详尽的著录,也当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孙子》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

(一)竹简本,(二)武经本,(三)十一家注本。

竹简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最早传世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比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的《史记》要早数十至上百年。有学者据此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毕竟不为完璧。且刘向、任宏等人校书,乃是从众多《孙子》古抄本中择善而从,其质量理应胜过汉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但不宜过于迷信。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上,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见《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二《李卫公问对》题解)。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孙子》的最重要版本之一,原为陆氏丽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购走,收藏在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书的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与武经本相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孙星衍《平津馆丛

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是现存《孙子》的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系统，但年代更早，错字也比武经本、十一家注本要少（参见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历史上武经本系统较有成就和影响的注解和研究著作主要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

十一家注本。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它也是传世《孙子》书中的重要版本之一，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其书著录仅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集注本，均属十一家注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十一家注本并不十分风行。一直到清代，才由孙星衍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的校订考辨工作，而使之重新焕发精神，声誉鹊起，一举打破了宋以来《孙子》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孙子》读本。

三、《孙子》的思想特点和理论价值

《孙子》全书计十三篇，约五千九百余字，篇幅并不很大，但其文义精粹，内容丰富，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也是孙武本人对战争经验和军事斗争规律的天才总结与揭示。

在战争问题上，《孙子》提出了“慎战”、“备战”为核心的“安国全军之道”。它对战争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开宗明义即表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坚决反对在战争问题上轻举妄动、穷兵黩武。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

慎而致战”，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同时要求加强战备，立足于有备无患：“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认为唯有“慎战”与“备战”并重，方可“安国全军”，在激烈的兼并争霸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孙子》还高度重视政治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注意到民心的向背问题，把“道”，即政治列为夺取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所有这些，都表明《孙子》对战争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战略上，《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把它视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为此，《孙子》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这就是强调“知彼知己”，系统全面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著名“五事”“七计”理论；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即加强军事实力的建设，造成“胜兵以镒称铢”、“胜于易胜”的有利态势；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到细致，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在实行方式上重视“伐谋”与“伐交”，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从而“必以全争于天下”。在作战行动上强调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即提倡“兵贵胜而不贵久”。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孙子》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全书中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也是孙子兵学理论的精髓所在。在“兵者诡道”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孙子》提出了一系列精辟、卓越的见解。例如主张争取作战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进攻性作战，“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做到“避实而击虚”；主张军事欺骗，示形动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形人而我无形”；要求做到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即所谓“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以正合，以奇